

北京计委干院图书馆



L019044

文字生涯

[法] 萨特著

侯志明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二年·北京

文字生涯

Wenzi Shengya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市人民文学印刷厂印刷

字数123,000 开本787×940毫米¹/₃₂ 印张7¹/₂ 插页2

1988年8月北京第1版 1988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9,110

ISBN 7-02-000539-X/1·640 定价1.65元

译 本 序

让-保尔·萨特(1905—1980)于四十年代前期蜚声法国文坛，到了四十年代后期，他的声望从法国的思想界、文艺界扩大到整个西方的思想文化界，乃至政治理论界，一时间成了叱咤风云的人物。这位公认的西方思想界巨头成为社会活动家之后，却在严酷而错综复杂的现实政治斗争中处处碰壁，连连受挫。五十年代前期，“萨特冲击波”盛极而衰。眼睛一直向前看的萨特，开始回顾自己的生活历程。他不无惊讶地发现自己的全部著作原是十分疯狂的产物：“我心安理得地认为自己是天生的作家”，“我是赋有天命的”。^①于是他决定撰写自传，追本穷源，“解释我的疯狂，我的神经病的起因”^②，试图说明以写作为天职的普卢如何演变成名震一时的萨特。他运用存在决定意识的思想和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方法进行了一次无情的自我批判。

^{①②} 《让-保尔·萨特谈〈文字生涯〉》，《世界报》1964年4月18日。

萨特从自己的出身、儿时的生活环境、所受的家庭教育以及本世纪初充满假想英雄的社会气氛入手，很快发现：“我实际上是一件文化家产。文化浸透了我，我以文化的光辉反射着家庭，如同傍晚池塘反射着白日的炎热。”这个书香子弟受到了典型的法国小资产阶级的文化熏陶。婴儿时丧父，和母亲一起寄居在外祖父母家。外祖父是新教徒，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外祖母是天主教徒，骨子里却怀着伏尔泰式的对宗教的怀疑。普卢凭耳濡目染，看出笼罩在他周围的宗教气氛只是家庭喜剧的组成部分。萨特在一九五一年说过：“我出身在一个半耶稣教半天主教的家庭，而对两教的争议，从十一岁开始，我的信念已确定”；“上帝不存在”；并确信“建立在宗教基础上的道德必然导致反人道主义。”^①在他的著作中曾多次引用尼采的名言：“上帝已经死亡”，并比这位推倒一切偶像和传统的“超人”走得更远，他一反笛卡儿证明上帝存在的逻辑推论，不无过分地扬言能“证明上帝不存在”^②。这部自传便是他的又一次尝试。可是我们知道，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虽然强调人的价值，把人视为自己命运的主宰，但始终难以完全摆脱宗教的外壳。何况

①② 《萨特谈萨特戏剧》，见《萨特戏剧集》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高卢人信奉基督教已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基督教思想长期统治着西方文化。人文主义思想尽管与之对立，但人们在探求万有的本原时，总想找个造物主，提出“人为万物之灵”，仿佛人负有神的使命。萨特受到了很深的影响，他虽然多次声称是“彻底的无神论者”，但始终没有讲清楚他提出的“他人”，“他人的目光”和“第四者，即组织者”究竟是什么。

一切哲学都要有个起点。萨特哲学思想的出发点是他多次引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名言：“倘若上帝不存在，一切都是可能的。”上帝不存在的假设使萨特处于窘迫的境况，但也使他获得“人注定是自由的”这个立足点。上帝不存在，人的价值失去了终极的依据、尺度和目的，人“被抛入这个混沌的世界”，“没有根据”，“没有意义”，面临这个敌意的、充满威胁的世界，人必然感到“焦虑”、“恐惧”，与生俱来的自由意味着“痛苦”、“苦恼”。那么人来到世上干什么？人的本质是什么？我是谁？这样，人的实在，人的地位，人的意识（即“自我”，主观之我），总之，“人”成了萨特存在哲学的中心问题。大凡哲学家把目光盯着人的共同性、人的本质这一普遍概念上，再根据这个普遍概念确定道德标准：“人的本质先于存在”。萨特把这个论点颠倒了过来：“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指出人赤条条来到世上并无本质可言，人“自我存在”以后才获得“自我本质”。萨特不同于弗洛伊

德，后者否定社会现实世界对“自我”具有决定性的制约作用。而他却承认人的存在决定人的意识；我们的思想“自然而然产生于我们所接受的文化”，但他认为可以摆脱外在世界的决定性作用而进行“自我选择”，“自我设计”，这种自由在他看来是绝对的。战争的悲剧使他明白：“单在任何情况下选择总是可能的结论是错误的，非常错误，以致后来我自己批判自己。”^①

萨特这里所说的人，是指具体的人，即具体的实例——一个人，不是一定社会关系的总和的人。他企图通过千差万别的某个现实的个体来说明人。一般哲学家只掌握普遍的原则，着力于理念的真实存在，而忽视具体的真实。萨特提出了挑战，他把个别的人作为他的存在哲学的对象。然而，了解和表现神秘的动物——人——是一门艺术，惟有文学家才能办到，所以哲学家萨特是和文学家萨特同时度过文字生涯的。

要了解 and 表现矛盾百出的、错综复杂的具体的人，在萨特看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不失为一种彻底的方法。尽管他对弗洛伊德关于潜意识，下意识的渴望，性意识等论点不以为然，但他身体力行

^① 《萨特谈“萨特戏剧”》，见《萨特戏剧集》附录。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版。

“弗洛伊德的有名理论：在实际生活里不能满足欲望的人，死了心作退一步想，创造出文艺来，起一种替代品的功用，借幻想来过瘾”。^①对萨特来说，“写作的欲望包含着对生活的绝望”，幻想不仅是存在的先导，而且是存在的本身。他说：“没有人知道我来到世上干什么”，“我觉得自己是多余的人”，但家人千方百计让他相信他“是奇迹造成的孩子”，“上天的礼物”，“天赐”的“神童”。在十九世纪度过大半生的外祖父向他“灌输路易·菲力浦时代流行的思想”，即救世渡人的理想，他“乍学时就比别人的思想落后八十年”，外祖父喜欢在各种场合扮演上帝老人，小普卢自个儿扮演孤胆英雄，救世主总是孤立无援的：“既然别人把我看作想象中的孩子，我就以想象来自卫”；“我是没有父亲的孤儿，既然我不是任何人的儿子，我的来源便是我自己”；“我没有超自我”。萨特此处用反讽的手法借用了弗洛伊德的术语（“自我”人格的三个层次：“本我”，“自我”，“超自我”），是一种文字游戏，但赋予新的含义：他不象贾宝玉那样成天感到贾政无形的威压，心头没有父威的阴影，只有外祖父的宠爱。他，“先知先觉的神童，小预言家，纯文学的埃利亚桑”，“把书房看作教堂”，天地万物层

① 钱钟书：《诗可以怨》，《比较文学论文集》第3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

层铺展在他的脚下，谦恭地恳求有个名字，“给每个事物命名，意味着创造这个事物又占有这个事物”。有了这个幻觉，他就自以为是命定永垂不朽的，必将写出伟大的作品：“上帝的创造物和人类伟大的作品是一脉相承的”。为了拯救全世界受苦受难的芸芸众生，他“一个人反对所有的人”，“引天下为己任，逆转乾坤救人类”；他“混淆着文学和经文”，自信用他的作品“保护人类不滚入悬崖深渊中”。然而，他痛苦地发现没有人发给他委任状。但卡夫卡说过：“我有一份委任状，但不是任何人授予我的。”^①于是，他“自授委任状，旨在保护人类”，深信文学能救世。

就这样，他夜以继日地从事文学创作：“二十亿人躺着安睡，惟有我，孑然一身为他们站岗放哨”，他“仿佛成了世界的代言人”。他塑造的主人公往往是作者自身的投影：“我按自己的形象塑造我的人物，并非原封不动照搬我的形象，而是按照我渴望成为的形象加以塑造。”他笔下的人物多为畸零人，孤立无援、只身奋斗的个人英雄，哈姆雷特式的人物，其悲剧在于“一项伟大的事业落在一个不能胜任的人肩上”^②。尽管自己选择的使命是美丽的、崇高

① 萨特答记者问，《世界报》1955年6月1日。

② 歌德，《维廉·麦斯特的学习时代》，《古典文艺理论译丛》，1962年第3期第131页，人民文学出版社。

的和神圣的,但责任太沉重了,到头来被重负压得粉碎。回首往事,就象从失恋中解脱出来的斯旺所说:“真想不到我为一个对我不合适的女人而糟蹋了一生。”究其原因,他说:“对大众的需求我一无所知,对大众的希望我一窍不通,对大众的欢乐我漠不关心,却一味冷若冰霜地诱惑他们”,“我是一个不买票的旅行者”。自以为肩负着关系到全人类的使命,有权占一个席位,“荒谬绝伦地把生活看作史诗”,“把艺术作品看作超验的成果,以为每件作品的产生都有益于世人”,以为“文人的唯一使命是救世,他活在世上唯一的目的是吃得苦中苦,使后人对他顶礼膜拜”。这就是他说的“始终不渝的幻觉”,“十足的疯狂”。“我自称为受百姓拥护的救星,其实私下里为了我自己得救”;“内心贫乏和感到自己无用,促使我抓住英雄主义舍不得放下”。其结果,如同一顶以自我为中心的“陀螺转啊转”,“最后转到一个障碍物上,停住了”。失败是必然的。

萨特还从世界观的高度对自己进行了剖析,承认自己“骨子里是柏拉图学派的哲学家,先有知识后见物体”。他把概念“作为实实在在的事物加以接受”,认为“概念比事物更真实”,以致他“对一切的理解都是颠倒的”譬如,“动物园里的猴子反倒不象猴子,卢森堡公园里的人反倒不象人”。从而“把文字看作是事物的精髓”,对他来说,“写作即存在”,他的

“存在只是为了写作”。他说：“由此产生了我的唯心主义，后来我花了三十年时间方始摆脱。”他长期把他的笔当作利剑，此时不无感叹地承认“无能为力”：“文化救不了世，也救不了人，它维护不了正义”，这个认识在他是长期而痛苦的努力的结果，得来不易。他终于“心明眼亮”了，“不抱幻想，认清自己真正的任务”；全心全意地投身于人民大众为自身解放的运动，这才是使他“彻底获救的事业”。

萨特一九五三年开始写这部自传，大部分文字完成于一九五四年，几经修改，一九六三年春才发表。他写自传的目的，正如他为苏联一九六四年俄译本作的序中指出的那样，是“力图破除一种神话”。从上面的概述来看，我们认为他是真诚的。萨特一生与文字打交道，是个多产的作家，下笔动辄洋洋洒洒几十万言，而且常常写完就脱稿，不喜欢修改。这本小书则被他压了十年之久，足见对自己进行否定性的批判是何等的艰难痛苦。萨特解释过为什么迟迟不发表^①，那是因为他发现对自己、对文学否定过了头，所以几易其稿，“磨去棱角”。不管怎么说，文化作为人类的产物还是有用的。“在书丛里出生成长”的萨特，肯定自己“也将在书丛里寿终正寝”。“尽管写作是吹牛皮，说假话，但总还有一些现实意义”。

^① 《萨特谈〈文字生涯〉》，《世界报》，1964年4月8日。

作家的努力不尽然徒劳无功吧。事实上他也不总是“死抓住热空气气球不放”，而是“千方百计要往下沉，恨不得给自己穿上铅底鞋”。在接触社会实际的过程中，有幸发现过“海底细沙上的珍奇”，并由他予以命名，就是说他看到自己的学说成了西方文化的一部分，认为自己对人类文化还是有贡献的。然而，他的“轻薄”不可抗拒地时常使他“浮在水面上”。他说：“时而我是浮沉子，时而我是潜水员，有时则两者皆是。”对自己采取了一分为二的态度。再说，作家在创作时，总或多或少把自己摆进去，即使是说谎，“说谎人在炮制谎言中发现了自己的真相”，也有好处嘛。这面批判的镜子让他看到自己的形象，从中认识自己，进而改造自己。萨特总结时指出：“我唯一感兴趣的事是用劳动和信念拯救自己。这种纯粹的自我选择使我升华而不凌驾于他人之上。”我们不能不承认这是他对自已漫长的文字生涯所作的实事求是的结论。

萨特这部自传是别出心裁、洗旧翻新之作，不同于一般的自传。作者独辟蹊径，不以叙述悲欢离合、时运兴衰的经历取胜，面把笔墨集中在自身内心的追求和心迹的剖白上，多层次地抒写自己潜在的心声。萨特的著作卷帙浩繁，内容庞杂参错，博大精深，文字又艰深晦涩，令人望洋兴叹。但他的这部自传却表现出他还有纤细入微、玲珑剔透的一面，且

文字洗炼，言简意赅，新颖脱俗，不落窠臼。他在琐碎的家常和世俗的应对中挑选一个片断，一个见闻，一个情绪，一个印象，一个想象，一个幻觉，间或穿插英雄传奇、历史掌故甚至神魔灵异，寄托他的哲理，以小见大，化寻常为卓异，给人以透视感，甚至细枝末节也可用来揭示人生的重大问题，好象一切事情都包容在他的哲学之内。由于他对自己的童年和童年残存的一切以及外祖父这一代“世纪末”的残辉采取否定和批判的态度，全书弥漫着反讽的基调和揶揄的笔触。时而正面叙述，时而反面烘托；时而正话反说，时而反话正说；间或运用夸张甚至漫画的手法，诙谐、俏皮而潇洒、超脱，妙趣横生地向读者展示他自我发现、自我扩张、自我认识的过程，同时也向读者展现当时的世态习俗，这也可说是刻划颓俗的讽世之作。书中的绝大部分素材取自作者六岁至十一岁的经历，但已足够构成一部完整的内心生活的自传了。萨特认为在人生的长跑旅途中至关重要是“起跑突破的能力”，“一旦冲破束缚，便能腾空而起”，然后就是“重复”，“不断再生”，一直跑到终点。的确，我们细心阅读，掩卷凝思：萨特的主要哲学思想和伦理观仿佛都已历历在目。无怪乎，作者虽然不止一次说要续写自传，但始终未成其美。大概没有必要了吧。再说，谁想了解他的具体经历，去读西蒙娜·德·波伏瓦写的回忆录好了，那里有详尽

的记载。

《文字生涯》发表后，法国以及整个西方文坛反响热烈，很快被译成各种文字（包括苏联的俄译本）。萨特罕见地受到了各界各派的一致好评，他的自传无争议地被视为大手笔独具只眼、独运匠心的文学精品。诺贝尔奖金的决策者们以为萨特经历了十余年坎坷的社会活动家生涯之后回到了纯文学的领域，为了表彰他的成就，决定向他颁发诺贝尔文学奖。但是出乎人们的意料，萨特谢绝了这项世界性的最高荣誉。因为这项荣誉不符合他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作为资产阶级营垒的叛逆者，他在皈依、觉醒、解脱之后，决不肯再回到资产阶级营垒。这在他的自传中已经说得清清楚楚：“我成为背叛者，并坚持背叛”；“我来到世上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清帐”。他不屑跻身于“荣誉席”之列，对他，“过去没有作用”，而“未来吸引着”他。他似乎以自己的行动发展了我国的一句老话：“过去种种譬如昨日死，现在种种譬如今日生”，将来种种譬如今日死。他不愿被荣耀置于死地，而要“从死灰中再生，用不断的创新把自己从虚无中解脱出来”。他说：“每时每刻都是我的不断再生。”重新开始，成为新人，这是他生活的强烈愿望。他的成就在他看来算不了什么，等于零，随风而逝；“必须一个小时比一个小时干得更好。”他总是他自己，同时又是另一个人，不断创造新的自我，生命

不息，奋斗不止。他确信：“我的心脏的最后一次跳动刚好落在我著作最后一卷的最后一页上”；“我最好的书是我正在写的书”，“明天写得更好，后天写得好上加好，最后以一部杰作告终。”他当时正潜心于他的鸿篇巨制《家庭的白痴》，后来一直坚持写到双目完全失明方始搁笔，终于以他惊人的毅力实践了自己的诺言。

沈志明

一九八七年七月八日

献给卓夫人^①

① 一九五四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二十四日让-保尔·萨特和西蒙娜·德·波伏瓦应邀访问苏联。他们跟陪同的法文翻译列娜·卓妮娜结下了友谊。一九六三年该书分两次刊登在萨特主编的《现代》上，题献给卓夫人（即列娜·卓妮娜）。一九六四年六月一日至七月十日萨特再度访苏，为卓夫人翻译的俄文译本《文字生涯》写过一篇短序。

目 次

I 读书.....	1
II 写作.....	123

I 读 书

一八五〇年左右，阿尔萨斯的一位小学教师为孩子所拖累，降贵纡尊改当食品杂货商。这个脱雅还俗的人巴望有一个补偿：既然他已放弃造就人才的事业，那就应当有个儿子从事塑造灵魂的工作：家里要出一个牧师。这件事落到夏尔头上，夏尔不干，甘愿背井离乡去追寻一个马戏团的女骑手。于是夏尔的画像在墙上被翻了个儿，从此不许提起他的名字。该轮到谁呢？奥古斯特赶紧学父亲的样，献身于商业，并对此感到心满意足。只剩下路易了，正好路易没有什么突出的天赋，父亲便抓住这个沉静的小伙子，转眼间让他当上了牧师。路易谨遵父命，竟至也亲自培育了一个牧师——阿尔贝·施韦泽^①。他的生涯我们都是知道的。

然而，夏尔没有找到他那位马戏女郎，而且父亲的高雅给他留下了印记：他毕生追求高尚情趣，醉

^① 阿尔贝·施韦泽(1875—1965)，法国神学家、哲学家，一九五二年获诺贝尔和平奖。